

变数常数、文化关怀与童心辨析——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进路探赜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Cultural Care and Childishness Discernment: An Exploration o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姚 睿 (Yao Rui)

内容摘要: 经历了8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中国的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界在与世界文论的持续对话中逐渐形成了文化自觉意识。作为知名的拉美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与作家，学者陈众议的研究带有广博的跨文化视野、深厚的学养与社会责任意识。他发展出“绝对的相对性”批评、“变数与常数”、“陌生化”与童心辨析等原创理论视角。陈众议立足于文明互鉴、本土文化与回归经典的价值立场，通过批判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与世界文学，为中国的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开拓出一条辩证发展的理论进路。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文化研究；陈众议；童心；话语建构

作者简介: 姚睿，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创作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文学与文化研究。

Title: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Cultural Care and Childishness Discernment: An Exploration o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bstract: After the “literary boom”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80s, the Chinese academia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has gradually formed a cultural self-awareness through ongoing dialogues with the theo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Chen Zhongyi,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interpreter and writer recognized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bodies a scholarly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his comprehensive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 profound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and evident dedication with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e has developed original theoretical viewpoints and introduced terms like “absolute relativity”,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in Literature” and “defamiliarization” criticism, and the notion of childishness thinking. Through

a perceptive critique of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ized world literature, Chen Zhongyi has established a dialectical theoretical path for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guided by value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and a return to classical ideals.

Key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Chen Zhongyi; childishness; discourse systems

Author: Yao Rui is Professor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nd dea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t Guangzhou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Film, Televis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yrkino@outlook.com).

陈众议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文艺理论家之一。作为身兼研究者、翻译家与创作者三位一体的“三栖”文艺理论家，陈众议先生凭借横贯西语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跨文化视野，在拉美文学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进路的探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作为作家型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扎实而充满创见；作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创作充满恣肆的想象力与激情；作为拉美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先行者，他甚至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坛创作的走向。作家阎连科将其誉为创作内部的内行与创作外部的专家。¹难能可贵的是，陈众议先生始终保持着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清醒自觉的批评立场，将他的学术立场与主张贯穿到文学、电影等各类艺术形式的批评实践之中，推动了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本文将陈众议先生及其研究置于比较文学理论的发展语境下，对其核心学术观点进行总结，试图挖掘出陈众议先生对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

一、文学理论的变数与常数思辨

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演进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以“加法”的方式对前人之思展开批判、扬弃与继承的过程。这种演进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评判推演出一套有效的术语体系与评判标准。作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前任所长、西班牙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与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陈众议先生主持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等多项重大项目，出版了十余部著述并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他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将“文学的变数与常数”作为核心的学术批评理念，

1 参见陈众议、阎连科：“文学资源两人谈”，《渤海大学学报》4（2018）：19-30。

充分运用于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

在文学的发展中,变数与常数难分难解,互相缠绕。陈众议先生将神话、传说、戏剧、小说与传记喻为文学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并在此基础上将文学的变数概述为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将文学的常数归纳为审美特征、社会责任、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情节与修辞,为文学的演变规律建立起参照系与研究框架。¹1、向下,“是指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17)。陈众议先生认为,文学自中世纪起便一路“向下”,人们开始拥抱人文主义,发现“人之美”,大部分以普通人与身体作为表征与隐喻的作品接踵而至。文学不再主要描写读者高不可及的王公贵胄和英雄豪杰,而将笔触指向普通人与底层人物。经此,文学经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向下”的状态愈发显著。²2、向内,即文学的表现内容从外部转向内心。陈众议先生引用西班牙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相关论述,认为故事已经掘尽,小说再不可能以情节取胜。“去情节”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充满危机的20世纪,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幻觉、梦呓甚至癫狂恰是表现灵魂孤独的有效形式。文学力求指涉灵魂深处的意识,关注跳跃的、梦幻的、忧郁的、陌生的与新奇的心灵片段,通过向内的形式拓新无限接近世界的真相。³3、向弱,主要指文学作品的人物呈现出由崇高到渺小,从英雄豪杰到凡夫俗子的“弱化”过程。陈众议先生特别指出,虽然向弱契合了现代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初衷,但容易滑入自说自话、无病呻吟与审丑美学的境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技术与知识合应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与话语的垄断,文化走向大众化,也进而滑向了对市场的迎合与对观众的献媚。对此,陈众议先生高屋建瓴地剖析了文学生产向弱的历史动力机制及其在当代的局限性。⁴4、向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作家视野的窄化,二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活动空间的窄化。前者由国家、民族、阶级等宏大叙事转向相对狭隘的自我叙事,后者由辽阔无边的世界发展到方寸之间的厅房。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逐渐摆脱了对时间的依附,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陈众议先生对文学空间向窄倾向的囊括与论述,在“空间转向”的理论基础上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话语。5、向小,即作家们纷纷放弃了过往“宏大叙事”高扬的“大我”,转而关注个体与“小我”。改革开放之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的推波助澜造成了虚无主义盛行。资本增殖的内生主张

1 参见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4(2023):83-98。

2 参见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东吴学术》1(2010):17-24。

3 参见陈众议:《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0-212页。

4 参见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4(2023):83-98。

批量生产着大众偶像。在这个意义上，陈众议先生痛心疾首地总结道：“屈原以降，无数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充满家国情怀的慷慨诗文。同样，大量演义记录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铿锵身影。及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有一系列红色经典继承和发扬大我精神。岂知倏忽之间，乌泱泱的‘私小说’和网络‘纯虚拟’占据了文坛的大半壁江山”（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85-86）。作为陈众议先生对世界文学流变的基本概括，“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这五大倾向相互关联，不分你我，呈现出全球化时代文学发展的复杂化趋势。

在“变数”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审美特征、社会责任、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情节与修辞这四大“常数”。¹其中：1、审美特征是文学的基本特征。陈众议先生通过对《论语》《诗学》等元文本的提炼，与对荷马、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等先贤的审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辨析提出审美是文学的基本常数与重要属性。2、社会责任体现出文艺作品的典型性与普遍性等特征，肯定了文艺在现实中的社会责任价值——美离不开社会责任。3、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是作家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法。如何使作品中的世界与人物运转起来将最终导致每个作家与作品的不同命运。“艺术的灵感来源于技巧”并非空谈，而是落实在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曹雪芹等文学巨匠具体的写作实践之中的。4、情节与修辞不应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中被否定与扬弃。相反，应当在眼花缭乱的流派与理论话语下，建立起内容与文体的独立性、丰富性与生动性，从而扭转各种思潮下的“轻情节”与现实主义以降的“轻修辞”倾向。

陈众议先生于杂乱无章、鱼龙混杂的世界文学之域去伪存真，精准地把握住了五个变数与四个常数，勾勒出其中变化、交织与演绎的轮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在五个变数与四个常数的论述基础上，陈众议先生提出了“学科史赋予文学研究以来龙去脉”以及“学术史以知其然及所以然为指归”的观点²，重新审视学科史与学术史在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论述了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本身的重塑与再造功能。这种高瞻远瞩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无疑是一次大有裨益的开拓。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批判

在全球化浪潮高歌猛进、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大行其道之时，陈众议先生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去民族意识化”现象以及文艺市场“没有中心，不分你我”、“泛娱乐化”、“资本逻

1 参见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4（2023）：83-98。

2 参见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4（2023）：83-98。

辑与技术理性合谋”等时代危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揭露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与价值的绑架、裹挟与掣肘。在他看来,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一种“伪多元”;“世界文学”言之过早;我们应当重视母语,重拾经典;文艺界应树立文化自觉。¹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将虚无主义描述为“一种总体估价的没落(即道德的总体估价)新的阐释力量付诸阙如”(246)。全球化时代文化艺术的去中心化态势及其高扬的无限多元、相对主义表象与虚无主义精心掩盖了其消费主义本质。对传统二元论的解构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展,加剧了现代人精神的颓废。陈众议先生提出:资本乐见于一个“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局面,它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或民族主义。²这一反诘可谓一针见血。陈众议先生沿着尼采、马尔库塞与费斯克等人的思想路径,将后现代的“价值阙如”转喻为“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向书而在》107)并对其进行批判,揭示出文化多元化内在的跨国资本主义一元化本质。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公派留学生,陈众议先生亲历了8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与后现代主义“无主流、无中心与无标准”的来临。对此,陈众议先生针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的论断,与袁可嘉先生对现代主义的表述“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形成呼应与互文。³将两者结合,可以发掘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关联及其内生危机。“后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为所谓娱乐至上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陈众议,《说不尽的经典》137)。当下,围绕跨国公司生产、销售的无孔不入的外来文化产品构成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着“差异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旗号,以灵活、隐秘的姿态,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意识形态渗透,使后者自愿接受前者建立的经济与文化秩序。由此,代表跨国资本的电影、广告、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才得以大行其道。“绝对的相对性”论断深刻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理念背后的资本与消费主义逻辑。⁴

陈众议先生不仅将他的批判实践置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场域,更是将其贯彻到电影、电视等传媒艺术场域。在“大众文化与跨国资本——以好莱坞为个案”一文中,陈众议先生揭示了好莱坞电影潜藏的意识形态裹挟功能,认为它“在提供感官刺激和精神愉悦(消遣)的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认知方式灌输给了世界观众,同时巧妙地借‘国际

1 参见陈众议、潘佳宁:“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意识——陈众议教授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4(2014):203-207;陈众议:“经典重估”,《江南大学学报》6(2016):68-71;陈众议:“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世界文学》1(2018):212-232。

2 参见陈众议:《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5页。

3 参见焦佩:“外国文学与文学发展规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1(2020):3-14。

4 参见陈众议:《说不尽的经典》,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137页。

明星’的衣食住行将美国产品推销到了世界各地”（陈众议 叶隽等 12）。好莱坞电影何以风靡全球？陈众议先生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好莱坞电影基于大众消费的取向，一是伪多元，二是通俗化。¹好莱坞大片所呈现出的“国际化”、“普世价值”与“多元化”本质上是美国化的价值呈现。《拯救大兵瑞恩》《美国队长》《阿甘正传》等国家主义内核的电影无不渗透着美国的意识形态，通过伪多元和通俗化等叙事方式将政治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叙事，诱导观众接受电影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陈众议先生对好莱坞电影的论断显示出他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触类旁通与鞭辟入里。

“民族”与“世界”并非决然对立，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在叩问全球化与文化虚无主义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表达了质问和忧虑：“世界是谁？”并断言“资本之外，一切皆无”（“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 118）。资本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主导其他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地位。全球化定义的“世界公民”掩盖了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不平等的事实。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掣肘下，“世界”等价于西方强势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它不仅在资本上，更是在话语权上彻底屏蔽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正因此，对世界文学进行批判、反思与追问并以此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以陈众议先生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18世纪，歌德曾构想“世界文学”的到来。陈众议先生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与孔子的大同理想与“礼崩乐坏”的感悟连接，肯定了其理想主义的愿景。²同时，陈众议先生把“世界文学”的构想放置在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浪潮的现实背景下进行剖析，认为当前欧美主导了世界文学话语体系，“世界文学”几乎可以和“欧美文学”画上等号。基于此，陈众议先生表达了他的质疑：“在他们这个‘世界文学谱系’中，作为中国最伟大文学杰作之一的《红楼梦》尚非经典，更遑论巴基斯坦文学、津巴布韦文学或巴巴多斯文学！”（“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 122）。“世界文学”以“文化大同”之名制霸文学经典与体系的话语权，导致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沉默与消亡。现实如此残酷，谈何“世界文学”？如果真的存在“世界文学”，它应该是世界各国文学的博采众长，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应当建立在相互吸引、相互尊重与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至少迄今为止当作如是观”（陈众议，“经典重估” 69）。于此，陈众议先生在批判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提出重视中国文学经典与体用结合的学术思想。重视中国文学

1 参见 陈众议、叶隽等：《外国商业电影及其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2 参见 高照成：“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2022）：23-28。

经典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止步不前。文学需要活水，需要融会贯通与取长补短。这一切的前提是坚守民族文学的自主性。

陈众议先生呼吁，应该重视我们的母语，回归文学经典。“语言文学作为人文基础，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语言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陈众议，“文学学科话语原理及其历史资源刍议”9）。语言和文学是一体两翼的关系。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语言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历史，凝聚着民族独特的处世哲学与思维方式。文学则是语言之“镜”与语言折射的思想价值。正如聂珍钊先生所言，“文学经典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承载着人类在历史上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解，并为我们现在社会 and 个人的生活提供借鉴”（“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34）。文学力求凝固语言，封存记忆、感觉与情感，在时空中跨越，赋予我们文化记忆。由是，回归母语便是回归故土，回归自身的文化认同，通过“对镜自照”的方式获得自我审视的途径。

三、文学的“陌生化”、距离与童心辨析

在陈众议先生的学术思想中，“陌生化”、距离与童心是其核心学术观念。“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重要术语，其影响力延续到现今的文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中。有关论著卷帙浩繁，但未有学者依托本土理论与话语资源对其概念的旅行、演化、确立及其与本土文艺创作的融合进行解析。陈众议先生另辟蹊径地从距离和童心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陌生化”理论，并依托本土资源辨析了“陌生化”与距离和童心的关系，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理论适用性。

因距离而产生的“陌生化”出现在诸多文学作品的内容之中。陈众议先生列举了博尔赫斯重述的《天方夜谭》故事、科埃略的《双梦记》、佛学经典当中的《大藏经》以及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等文学作品中的“陌生化”手法，并对陌生化的距离、眼光与寓言产生的审美效果进行了深入辨析。陈众议先生认为，今天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更多是为了获得对外国文化与故事的认知，这本质上就是“陌生化”过程。该论点肯定了“审美距离”在认知活动为主体赋予的意义。读者如能与所在的文化母体形成距离感，便可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陈众议先生列举了博尔赫斯的例子，后者把《红楼梦》归类为幻想小说。这种看法显然不能服众，但不失为一种“陌生化”的解读。¹“陌生化”与距离为文学的接受过程提供了崭新的解读视角。在“陌生化”的期待中，读者穿梭在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通过阅读完成心灵冒险、认知、解构与重构之旅。

不仅如此，“陌生化”与距离还转化为陈众议先生从事文艺研究与创作

1 参见陈众议：“‘陌生化’与经典之路”，《中国比较文学》4（2006）：11-22。

实践的内在属性与价值立场。由于他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他的研究结论往往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早在1984年就提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文学的“寻根文学”是其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与“导火线”，为中国“寻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参照与凭依。¹其二，他对学界高度推崇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澄清，提出所谓幻想融合现实的创作手法早已是古今所有文学创作的共性。他还对马尔克斯本人所说的“拉美现实的魔幻与神奇”表达了质疑，认为不可完全相信作家的话。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真正独到之处，在于它折射出了拉丁美洲的集体无意识。²其三，他对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的博尔赫斯的“书斋式”写作进行了追本溯源，揭示出博尔赫斯的某些作品是基于他人作品的“再创作”，从而破除了博尔赫斯的“作家们的作家”神话。³其四，对乔伊斯等强调写作技巧的作家与市场 and 资本的共谋关系进行了有保留的评述。⁴其五，在《西班牙文学：中古时期》《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宏论之中，援引了大量一手资料对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学与墨西哥文学进行历时性分析，详实论述了阿拉伯人在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后对西班牙文学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弗莱的“原型批评”、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对作家卡彭铁尔的援引，为西班牙文学、古代印第安文学与墨西哥文学等拉美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阐释提供了全新维度。洞悉作家创作背后的秘密，必须得具备深谙其道的创作经验、学养与才情才能得以实现。作为作家型学者的陈众议先生对此具有信手拈来的从容。秉承着距离与“陌生化”的理念，陈众议先生在研究中展现出前所未见的史料与另辟蹊径的独到创见，不仅带有颠覆常识的乐趣，也为学界开辟了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

童心是构建“陌生化”的关键。文学的“陌生化”手法试图从孩童视角对世界进行重新挖掘、打捞与建构，以恢复人们对生活的原初印象，打破沉疴的处世顿感。儿童睹世的眼光先验地带有诗性与接踵而至的惊奇感。儿童常因涉世未深而较易得到刻骨铭心与弥足珍贵的审美与认知体验。在陈众议先生的论述中，文学“陌生化”的底色便是童心。童心总是与纯真、无邪与无忌相关联，总是在直面“陌生”。如此，童心与文学的“陌生化”写作不谋而合。童心的逝去不可避免，但所幸，文学艺术的存在得以留住童心。

“而今，人类虽然早已远离童年，但童年的艺术创造一直通过其不灭的原型顽强地、鲜活地留存于这个世界艺术”（陈众议，“‘陌生化’与经典之路”21）。神话是一切伟大故事的基本因子，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艺术创造，

1 参见陈众议：“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外国文学研究》4（1984）：61-66。

2 参见陈众议：“评莫言”，《东吴学术》1（2013）：5-12。

3 参见陈众议、阎连科：“文学资源两人谈”，《渤海大学学报》4（2018）：19-30。

4 参见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

这种创造彰显出人类旺盛的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童心从远的说是神话母题，从近的说是一种尽力摆脱了世俗束缚的相对纯粹的审美活动，从而对某些宏大的理论保持警惕。文学最重要、最可贵的也许就在于保持住这颗纯洁的童心，并使之充满愉悦”（陈众议，《游心集》336）。因之童心，麻痹人心的日常生活获得二次审验与咀嚼的可能，以此重焕光彩。文学的“陌生化”让“少见多怪”语境下的“无知”转变为“人生若如初见”般的渴望，以审美接受的方式使精神“返老还童”。文学中的“童心”见诸中西方神话、传说与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永恒的理想与追求，童心理应成为人类构建理想人格的归宿与家园。

陈众议先生缘何对童心如此关注？一方面，童年乃人生伊始，其珍贵性自不必说。许多艺术家都热衷于描写童年，在创作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掺杂童年经验。这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另一方面，这也来自陈众议先生对童年的体会和感悟。作为绍兴人，陈众议先生从小受地方无数文人墨客精神足迹的启发与熏陶，一心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之中。他日后在复旦大学与墨西哥的求学生涯也处处彰显出“童心剖诗”的学习激情。童年经验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陈众议先生的精神秉性与人格气质。如他所言，“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214）。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使陈众议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处处流露出童心与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

那么，中西方经典文论中是否也存有“陌生化”与童心的踪影呢？陈众议先生对中西方文论中与“陌生化”和童心相关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也进行了深入思辨，别出机杼地提出了他的独到创见。童心之文学，方为真文学——这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文学思想核心。在李贽看来，“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563）。李贽所高扬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童心。在他那里，童心是用以反抗封建礼教，批判时人之虚伪的工具。陈众议先生认同李贽对于童心之真的看法，但认为其只说对了一半。童心不仅有“真”，还有“幻”的一面，二者都能在中西方经典文学中找到无数的例证。进而，陈众议先生将童心在《红楼梦》《堂吉珂德》与《百年孤独》等经典文学中的发展脉络娓娓道来。在曹雪芹笔下，宝玉的童心在于“真”，体现在他的情感不加修饰，由心而发。他的“真”在礼教社会不合时宜，又难能可贵。刘姥姥出场不多，却贯穿始终。作为贾府之外的第三者，她的“真”反衬出贾府的穷奢极欲，见证了贾府由盛转衰的巨变。在西方文学经典中，塞万提斯笔下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情节表现了童心之“幻”。这一情节天真荒唐，却又有着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塞万提斯生活的时代，人文主义誓要冲破一切藩篱。正因如此，《堂吉珂德》被推崇为理想主义的经典。堂吉珂德的悲剧在于追求不可求之物。生活的荒唐与残忍

彰显了堂吉诃德的童心之可贵。¹在马尔克斯的著作《百年孤独》中，童心之“幻”则表现为马孔多人在面对冰块、磁块、火车、电灯等器具时所产生的惊奇、激荡乃至恐惧——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屡屡拨弄着读者麻木已久的内心。值得注意的是，“真”与“幻”并非截然两立。陈众议先生认为，“所谓童心，也许本来就是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或真即是幻，幻即是真”（“‘陌生化’与经典之路”19）。在“童心剖诗——论博尔赫斯的老虎、镜子与迷宫”一文中，陈众议先生从博尔赫斯的童年入手，对其作品、自述与遗留物品进行了剖析，认为其中有三大关键意象——老虎、镜子与迷宫。他进而谈到：“20年代开始，博尔赫斯就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叔本华式的怀疑主义者。而童年的遥远、童心的模糊又那么真切地实现了这种怀疑：真虎与梦虎、镜子与现实、迷宫与世界或者书本（文本）与读者、读者与诗人、诗人与宇宙、宇宙与书本之间的关系乃是何等的确定与不确定”（“童心剖诗”91）。

西方文学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保护童心。即使在现实主义风行的19世纪，人们也没有忘记肯定塞万提斯那种孩童般的随心所欲。在中国文学经典中，童心尤其宝贵。陈众议先生谈道：“我们很早就放弃了神话思维，即便不断地有一些美好的传说和想象，也总会很快地被赋予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浓重色彩”（《游心集》336）。如《天仙配》的最早版本出自东晋时期的《搜神记》，而后人画蛇添足式地在其中加入宏大叙事的成分，致使其中的天真被极大地消解。²儒家文化有着积极的入世主张，而传统文学又有着“文以载道”的强烈诉求。在功利主义的文化熏陶下，中国文学不免成了“早熟的儿童”。在对重要的中西方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一以贯之地在文学研究中阐释童心的重要性。他也在各类著述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学神话思维逝去的惋惜，多次呼吁挖掘“集体无意识”下的童心与“陌生化”思维，表达了一个学者对传统文化精神回归的寄望。

四、深厚学养与责任意识

坚持将创作、翻译与研究贯穿学术生涯，是陈众议先生治学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钟书、杨绛、卞之琳、袁可嘉等诸位知名学者的影响下，陈众议先生不仅坚持学术深耕，更是在文学创作领域探索出了独特天地。他创作出《如是所闻》《冥合天人》《玻璃之死》《风醉月迷》等拥抱现实、叩问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小说经典及大量杂文与散文，体现了体用合一与知行合一的学术主张。陈众议先生对于文学创作的方法与体悟是独特的——寓言般的情节铺陈、生动的人物塑造与语言修辞也抵达了“以文学的方式研究文学”的境界，而此境界非有陈众议先生“作家型的学者”与“学者型作家”的身份才能实现。

1 参见陈众议：“‘陌生化’与经典之路”，《中国比较文学》4（2006）：11-22。

2 参见陈众议：《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6页。

陈众议先生在其文学创作中践行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与重塑。他的小说里展现了大量《老子》《庄子》《红楼梦》与唐诗宋词，显示出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为。同时，他还在情节中融入了心理学与社会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古今对话诠释与强化中华民族的审美价值与共同体意识，显示出他基于本土文化的创作自觉以及作为学者的深厚学养与文化情怀。

陈众议先生的小说显示出他对现实的独特思考与社会责任意识。比如，在《如是我闻》这部以揭露迷信为己任的小说中，陈众议先生表达了破除迷信和回归理性的诉求。在当下的媒介融合与数字时代，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介已成为现实不可忽视的所在。陈众议先生敏锐地展现出克隆、剧本杀、元宇宙与虚拟空间等时代议题，对由此产生的媒介与技术伦理进行深入思考，使他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当代性。

创作实践和翻译经验也对陈众议先生的学术生产形成反哺，使他对国内文艺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与深入分析。在跨国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艺界提前进入了“全球化”及“娱乐至死”的狂欢。陈众议先生将其总结为：“或轻浮或狂躁，致使伪命题及去中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文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陈众议 高照成 119）。面对如此乱象，陈众议先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集团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陈众议 高照成 119）。全球化建立于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先发优势之上，既是西方发达国家维系现有秩序的战略选择，也是资本增值的天性使然。资本借助跨国流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对各国文化的隐秘控制。对此，陈众议、王宁、聂珍钊等学者共同呼吁回归文学经典的重要性。陈众议先生以忧国之心、兴国之责的态度揭开跨国资本的面纱，并警醒人们，面对跨国资本主义缔结的神话应保持清醒。

面对跨国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扩张，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应当何去何从？陈众议先生提出，拉美文学的发展道路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拉美当代作家成功的秘诀是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亦即我国五四作家所取法的拿来主义——正确处理民族性和世界性、继承与扬弃、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游心集》133）。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的成功无疑对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群体形成鼓舞。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成功只有在后工业时代，依靠跨国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政治才有可能实现。¹对于文艺界而言，全球化时代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正是

1 参见陈众议、阎连科：“文学资源两人谈”，《渤海大学学报》4（2018）：19-30。

全球化带来的分工与协作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机会。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资本支配者的话语压力，文艺界绝不能自我放逐，当谨慎面对，重新审视与发现文学经典的价值。面对文学经典，聂珍钊先生提出：

“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精华，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过去或现在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42）。陈众议先生也提出：“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陈众议先生对外国文学界“引进多、分析少，借鉴多、批判少，向西多、自顾少”的现象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应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五四运动传统发扬至当下，以外语翻译、外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研究路径，在体用结合与知行结合的辩证法中挖掘中国母体文学与文化的拓进之路，在中外互鉴的文化交流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通过对陈众议先生的核心学术思想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学术研究为其赋予的独特人格魅力与社会责任意识。陈众议先生对西方发起的“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保持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对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学说进行了纠正，这种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理论自觉彰显出陈众议先生鲜明的学术立场与广阔的跨文化视野。陈众议先生从常数变数与童心辨析等方面为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以学科史与学术史的高度对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了设定，推动了我国的“四个自信”和“三大体系”建设。

Works Cited

- 陈众议：《西方当代文化思潮评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Chen Zhongyi. *Analysis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ends of Though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 ：《向书而在》。深圳：海天出版社，2017年。
 [— *Being in the Book*. Shenzhen: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2017.]
- ：《想象的边际》。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
 [— *Boundary of Imagination*. Guangzhou: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15.]
- ：“童心剖诗——论博尔赫斯的老虎、镜子与迷宫”，《文艺研究》4（2002）：83-91。
 [— “Childishness Analysis of Poems: On Borges’s Tiger, Mirror, and Maze.”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4 (2002): 83-91.]
- ：“经典背反及其他”，《外国文学研究》2（2010）：71-79。
 [— “Classics, Contradictions and Other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0): 71-79.]

- : “‘陌生化’与经典之路”, 《中国比较文学》4 (2006): 11-22.
- [—: “Defamiliarization and the Path to Canon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4 (2006): 11-22.]
- : “文学学科话语原理及其历史资源刍议”, 《当代外语研究》4 (2021): 5-12.
- [—: “On Discourse Principles of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and Its Historical Resourc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4 (2021): 5-12.]
- : 《说不尽的经典》。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0 年。
- [—: *The Endless Classics*.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20.]
- : 《游心集: 陈众议自选集》。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 *A Journey of the Mind: Chen Zhongyi's Anthology*. Zhengzhou: Henan UP, 2011.]
- : “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 《东吴学术》1 (2010): 17-24.
- [—: “Lower Realism and Classics Contradiction.” *Soochow Academic* 1 (2010): 17-24.]
- : “评莫言”, 《东吴学术》1 (2013): 5-12.
- [—: “On Mo Yan.” *Soochow Academic* 1 (2013): 5-12.]
- : “经典重估”,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 (2016): 68-71.
- [—: “Reevaluation on Classics.”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16): 68-71.]
- :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 [—: *Research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ervantes*.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 “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 《外国文学研究》4 (1984): 61-66.
- [—: “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1984): 61-66.]
- :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4 (2023): 83-98.
- [—: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in Literature: ‘Extrinsic Research’ and ‘Intrinsic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2023): 83-98.]
- :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世界文学》1 (2018): 212-232.
- [—: “Why Do We Nee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1 (2018): 212-232.]
- 陈众议、高照成: “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2018): 118-123.
- [Chen Zhongyi and Gao Zhaocheng. “Consumerism and ‘World Literature’.”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 (2018): 118-123.]
- 陈众议、潘佳宁: “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意识——陈众议教授访谈录”, 《当代作家评论》4 (2014): 203-207.
- [Chen Zhongyi and Pan Jianing.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Researc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en Zhongyi.”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 (2014): 203-207.]
- 陈众议、阎连科: “文学资源两人谈”, 《渤海大学学报》4 (2018): 19-30.
- [Chen Zhongyi and Yan Lianke. “A Discussion on Literary Resources between Chen Zhongyi and Yan

Lianke.” *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 (2018): 19-30.]

陈众议、叶隼等：《外国商业电影及其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Chen Zhongyi and Ye Jun et al. *Study on Foreign Commercial Film and Its Influen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4.]

高照成：“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2022）：23-28。

[Gao Zhaocheng. “Research on Foreign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An Interview with Chen Zhongyi, Researcher and Member of the Faculty.”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2 (2022): 23-28.]

焦佩：“外国文学与文学发展规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1（2020）：3-14。

[Jiao Pei.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Chen Zhongyi, Member of the Facul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1 (2020): 3-14.]

李贽：《焚书》，张建业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Li Zhi. *Burning Book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Zhang Jiany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文艺研究》5（2013）：34-42。

[Nie Zhenzhao. “Reading, Interpretation, and Value Discovery of Literary Classics.”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5 (2013): 34-42.]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Nietzsche, Friedrich William.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